【社会经济史研究】

略论清朝开发台湾的经贸政策

李细珠

【摘　　要】清朝政府在台湾实行积极的经济开发政策，如推行发展农业生产、减免田园赋税、促进商品贸易，以及兴办洋务事业等措施，不仅大大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使闽台经贸圈形成，从经济上加速了台湾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使台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时期，在严重的边疆危机中，清朝政府加强海防建设，在台湾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使台湾建省之后迅速崛起，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也得以顺利启动。“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

【关 键 词】清代台湾；经贸政策；米糖经济；闽台经贸圈；台湾近代化

【作者简介】李细珠，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京），2023.3.98～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政府治理台湾政策研究”（编号17AZS007）；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基金重大项目《台海两岸关系历史与现状研究》（编号LSYZD2019011）。

清代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发展与开发时期。清朝前中期在台湾实行积极的开发政策与措施，使台湾以稻米与蔗糖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得以较快发展，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粮仓与糖库，不仅保障了台湾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还能反哺内地，甚至对外出口。随着台湾全岛的逐渐开发，台湾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经济区域；与此同时，闽台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经济渐趋一体化，闽台经贸圈形成，也使台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血肉相连、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时期，在中国东南海疆危机中，台湾遭受西方列强与日本的武力侵略，被迫开放台湾府城（安平）、淡水（沪尾）、鸡笼（基隆）、打狗（高雄）四个通商口岸，与祖国大陆一起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应对边疆危机，清朝加强东南海防，把台湾改建行省。在洋务运动中，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闽台大员领导台湾的自强新政，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

一、实施农业发展政策与米糖经济发达

清代台湾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稻米与蔗糖是主要的农产品，故有所谓米糖经济之称。

清朝在台湾实行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主要有三：一是鼓励移民垦荒。康熙统一台湾后，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其时台湾除台南部分地区业已开垦以外，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原始状态，广袤原野，满目荒痍。“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①]清朝的首要开发举措就是垦荒。首任知府蒋毓英到台之后，“经划三县疆域，集流氓，垦荒地，安辑诸番，教以授产之法”。[②]诸罗知县张王尹莅任之初，“邑土广漠，多未开垦，招徕流氓拓田，黾勉抚绥，至者如归市，不数载，农事大兴，民亦殷庶”。[③]台湾府县官员为鼓励移民垦荒，给垦户颁发开垦荒地的垦照，允许垦户“招佃开垦，三年后输纳国课”。[④]官府承诺在荒地开垦三年后才开始征收赋税，是对垦荒的积极鼓励举措。

二是兴修农田水利。水利设施是发展农业的根本保障，台湾官府对此非常重视。施琅复台后即在凤山修筑著名的将军陂，[5]是台湾灌溉水利工程的示范。康熙末年周钟瑄任诸罗知县，“时县治新辟，土旷人稀，遗利尚巨，乃留心咨访，劝民凿圳，捐俸助之，凡数百里沟洫，皆其所经画，农功以兴”。[6]周钟瑄捐银、捐米谷助修陂圳，其主政诸罗县时，该县修筑陂圳达75条之多。[7]道光中期，曹谨任凤山知县，“当是时，凤山平畴万顷，水利未兴，一遭旱干，粒米不艺。谨乃集绅耆，召巧匠，开九曲塘，筑堤设闸，引下淡水溪之水，以资灌溉，为五门，备蓄泄。公余之暇，徒步往观，杂以笑言，故工皆不怠。凡二年成，圳长四万三百六十丈有奇，润田三千一百五十甲。其水自小竹里而观音，而凤山，又由凤山下里而旁溢于赤山里，收谷倍旧，民乐厥业，家多盖藏，盗贼不生”。台湾道姚莹为表彰其功绩，特命名曹公圳。后又与当地士绅捐资增开曹公新圳，“润田尤多”。[8]据统计，清代台湾共修筑陂圳水利工程966个(条)，其中康熙朝103个，乾隆朝140个，道光朝160个，光绪朝349个，形成四个水利开发的高潮期。[9]除曹公圳以外，尚有八堡圳、瑠公圳、大安陂等大型水利工程，其余大多为小型陂圳，业已形成密集的农田水利灌溉网。

三是改良农产品种。其中以水稻品种的改良最为显著。据台湾学者利用方志资料对清代台湾稻种变迁的量化研究，康熙三十三年(1694)台湾有12种稻种，光绪十六年(1890)增加到48种，将近200年间新增品种41种，消失5种。其中从康熙五十九年到乾隆二十九年(1720–1764)，40余年间新增品种24种：圆粒、吕宋占、大伯姆、占仔秫、鹅卵秫、秫栗、三杯、来天、内山早、清游早、红脚早、大头婆、白肚早、安南早、七十日早、一枝早、鸭母潮、番仔秫、乌尖、三杯择、花螺、白秫、牛索秫、芒花秫。[10]这些品种有不少是早熟稻，早熟稻生长时间短，使台湾水稻种植从一年一熟的单季稻变成一年两熟的双季稻。早熟稻的引进与推广，大大提高清代台湾土地的复种指数，同时使稻米产量大幅增长。

清朝通过实施以上政策与措施，使台湾的土地得到开发，形成以稻米与蔗糖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区域。

在康熙统一台湾之初，由于蔗糖商品价值较高，糖价高于米价，百姓趋利，群趋开垦蔗园，种植甘蔗，一时使蔗园面积大大超过稻田面积。第三任分巡台厦兵备道高拱乾公然发布告示——《禁饬插蔗并力种田示》，力劝百姓少种甘蔗多种田。他在具体分析台湾缺粮的现状之后说：“不谓尔民弗计及此，偶见上年糖价稍长，惟利是趋。旧岁种蔗已三倍于往昔，今岁种蔗竟十倍于旧年。蕞尔之区，力农止有此数，分一人之力于园，则少一人之力于田；多插一甲之蔗，即减收一甲之粟，年复一年，有加无已。夫果有利尔民，本道岂不乐从。但尔民愚无远虑，止知种蔗硕糖便可取利，殊不知人尽种蔗，则出糖倍多，糖多则价必贱，不比上年之糖少价长也明矣。在岁丰之日，固可以糖易谷，输课并供粮食。万一复遇岁歉，寡收稻谷，种田有谷者除完课外，计日防饥，必不见贷于人。尔种蔗者有糖不足以为谷，非特无以完公，更思靡可糊口。数万军民需米正多，则两隔大洋，告糴无门，纵向内地舟运，动经数月，谁能悬釜以待？是尔民向以种蔗自利者，不几以缺谷自祸欤。……须知竞多种蔗，势必糖多价贱，允无厚利，莫如相劝种田，多收稻谷，上完正供，下赡家口，免遇岁歉，呼饥称贷无门，尤为有益。”[11]高拱乾观察到，台湾的米糖经济业已形成“米糖相克关系”，大有此消彼长之势。然而，其一纸告示并没有使台湾农民立即放弃追求种蔗的利润而转向种田。据乾隆时期《重修台湾府志》“赋役志”的记载，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雍正十三年(1735)，台湾田园从18453甲增加到52862甲，新垦田园34408甲，其中田从7534甲增加到14774甲，园从10919甲增加到38088甲。[12]在此50年间，田增长不到一倍，而园增长了两倍多。田主要是指稻田，园则主要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康雍时期新垦田园34408甲的数据来自官方“赋役志”的记载，是正式报垦升科数，与实际开垦数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田数，多有隐瞒。业户将成熟田园以多报少，欺隐之田远多于报垦之数。雍正四年(1726)，闽浙总督高其倬奏称，台湾开辟之初，文武官员及士绅豪强皆任意报占田土，“又俱招佃垦种取租，迨后佃户又招佃户，辗转顶授，层层欺隐。……佃户之下皆多欺隐，佃户下之佃

户又有偷开，至业主不能知佃户之田数、人数，佃户又不能究其下小佃户之田数、人数，实则种百亩之地不过报数亩之田，究竟粮少田多，是以家家有欺隐之产，人人皆偷开之户”。[13]高其倬的奏报或有夸张，但由于复杂的租佃制度，其时台湾能够征收赋税的田数，远远少于实际开垦田数，则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康熙末年，台湾已是“糖谷之利甲天下”。[14]其时台湾米谷在丰收之年业已实现自给，还有多余运销内地。据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观察，台湾“三县皆称沃壤，水土各殊。台县俱种晚稻。诸罗地广，及凤山淡水等社近水陂田，可种早稻。然必晚稻丰稔，始称大有之年。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15]但当时为了保证台湾的粮食供应，官府严禁台米外运，不仅影响了台湾农民生产稻米的积极性，而且影响了福建泉州、漳州两府的米粮供应。雍正四年(1726)，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开放台湾米禁，有谓：“台湾地广，民间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为自身食用，亦图卖出赚钱。一行禁止，则囤积之米废为无用，既大不便于台民，而泉、漳二府仰待外米，乃绝其资藉之源，又大不便于泉、漳之民。究竟泉、漳之民势不得不买，台湾之民亦势不能不卖，遂生种种弊端，偷买偷卖，奸巧百出。……禁之愈严，其弊愈巧。……臣查开通台湾遏米之禁，其益有四端：一，泉、漳二府之民有所资藉，不苦乏食。二，台湾之民既不苦米积无用，又得卖售之益，则开田愈力。三，可免泉、漳、台湾之民因米粮出入之故，受指勒需索之累。四，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买福州之米，福州之民亦可稍免乏少之虞。”[16]高其倬的建议得到清朝采纳，此后台米开禁，米价上升，有助于鼓励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

随着土地不断被开发，雍正年间，台湾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已经基本形成。乾隆以后，台湾取得东南“粮仓”和“糖库”的地位，台米与台糖通过海运源源不断地供应大陆，闽台一体化有了强劲的经济纽带。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是台湾稻作的全盛时期。随后，台湾的粮食生产逐渐由盛转衰。光绪时期，台湾全岛开辟田园共计有50万余甲，其中稻田约占四成，大概在20万甲左右，其余约30万甲主要生产茶、糖、樟脑等经济作物。台湾农业经济结构遂由米粮生产逐步转变为茶、糖和樟脑生产。[17]

二、移植福建租税制度

清代台湾的赋税主要是田赋。康熙统一台湾之初，清廷派往福建料理军前粮饷事务工部右侍郎苏拜与福建督抚、提督等会议台湾应缴钱粮数目时，基本上按照明郑旧制，“较伪藩郑克塽所报之额相去不远”。施琅疏请对台湾“沛以格外之泽，蠲减租赋”。[18]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比照明郑田园科则予以酌减，制定新的田园赋则，规定：上则田每甲征粟八石八斗，园每甲征粟五石；中则田每甲征粟七石四斗，园每甲征粟四石；下则田每甲征粟五石五斗，园每甲征粟二石四斗。其时台湾府实征粟共计92128石余。以后随着田园开垦进程而逐年增加，康熙二十五年(1686)，台湾府共应征粟113347石余。[19]

清初台湾赋则虽然是从明郑蠲减而来，但与内地相比，其赋额重在一倍以上。“内地之田论亩，凡折算二百四十弓为一亩，以六尺为一弓。台湾之甲论戈，凡东西南北各二十五戈为一甲，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计田园一甲，约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零。内地上则田一亩，各县输法不一，若征折色，自五、六分以极一钱一分而止；即以最重者而论，田十一亩三分一厘，不过征银一两二钱二分零。台湾之田，上则每甲每年征粟八石八斗，即以谷价最贱之时而论，每石不下银三钱，凡征本色二两六钱四分。由田以例园，由上则以例中下，虽赋税较郑氏豁免已多，且不止加倍于内地矣。”[20]台湾田赋之重，引起在台地方官及巡台御史的注意。雍正五年(1727)，巡台御史索琳、尹秦上奏，指出台湾业主与佃丁均有意隐瞒田园数目，“辗转相朦，遂至百甲田园完粮者不过二、三十甲，此通台相沿之大弊也”。究其因由，主要还是科赋太重，“现征科则，计亩分算，数倍于内地之粮额，若非以多报少，不能完纳正供”。[21]

雍正九年(1731)，福建总督刘世明以台湾田园旧例按甲征粟，比内地科则较重，“请照内地同安县地亩官、民、盐等则之例，按亩征收。以每甲化为一十一亩，分别上、中、下之差。将上田照同安民米例，每亩征银八分五厘三毫四丝，秋米六合九抄五撮；中田照同安盐米例，每亩征银六分五厘八毫八丝四忽，秋

米三合八抄七撮;下田照同安官米例,每亩征银五分七厘五毫五丝,不征秋米。上园照中田例;中园照下田例;下园照盐米不征盐折例,每亩征银五分六厘一毫八丝,不征秋米。所有新升田园,已经征粟者,仍照征本色。其雍正七年升科以后续垦未经汇题,及将来新垦田园,统以此案题定,永为报垦之准则”。户部议覆:“其雍正七年报垦及以后续垦田园,先恳改照同安则例征粮,应如所请。台属报垦田园及自首升科者,俱以雍正七年为始,化甲为亩,照同安例分别上、中、下征收银米。至改则田园,亦如所请,照台例将每亩所征钱粮统照三钱六分折粟一石核算,征输其本色。米石照一米二谷之例,折粟征贮可也。”奉旨“依议”。[22]改制后的新的田园赋则,按照同安则例征收银米的标准,实际上还是折算为粟米征收。上则田每甲征粟二石七斗四升有奇,中则田每甲征粟二石八升有奇,下则田每甲征粟一石七斗五升有奇;上园照中田,中园照下田,下园每甲征粟一石七斗一升有奇。“新则较轻旧则不啻数倍。”[23]其实,新则赋额不仅比旧则大为减轻,直接减少了台湾垦民的负担,有助于推进台湾土地开发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台湾赋则与福建同安则例一致,对于闽台一体化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清代台湾是通过大规模垦荒而崛起的新兴农业区域,又是地权分化最为普及、最为典型的地区。康熙、雍正时期,在大规模移民垦荒过程中移植了大陆永佃关系,形成“一田二主”复杂租佃关系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台湾“一田二主”的现象最初是在垦荒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又是大陆上某种租佃关系的移植,大陆移民,尤其是福建漳州府籍的移民,为“一田二主”的租佃关系提供了“大租”与“小租”的形式;雍正九年(1731)清朝调整台湾新垦田园赋则后,为“大租”“小租”的普遍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台湾“一田二主”的租佃关系,不是简单的地主与佃农两方面关系,而是涉及垦户、佃户、现耕佃人三重关系。垦户是向官府申请垦照获得土地开垦权的业主。清代开辟之初,“县官出示招民开垦,冀以扩张疆界,而充益国课。无如台岛地广人稀,阡陌之利未开,赋政之源未出,故凡有赴官衙请垦者,不问贵贱,悉行照准,祇以速成为效。官将原禀照抄,批示许可,字据盖用县印,给付垦户执凭,听其备咨招佃兴工开垦,三年之后,照例禀报成科,配纳供课。至开垦之初,先则指明地段四至界址,继则养佃陆续开垦,故无立定期限;或因许可之地,该垦户垦成之田园未及半数,中间生变而中止;或财力不继,而转给他人垦耕,虽情状不同,而其接续之权,必有另立契约,而无请官登记。此清代开垦之惯例也”。[24]垦户向县衙申请开垦土地的垦照,再招募佃户,进行荒地开垦。

佃户是向垦户承租土地的实际开垦者。有招垦文书记载:“立招佃人业户李朝荣,明买有大突青埔一所,坐落土名巴刘巴来,东至柳仔沟埤为界,西至大沟为界,南至入社大车路为界,北至黄邦杰厝后港为界,四至明白。今有招到李思仁、赖束、李禄亭、梁学俊等前来承赎开垦,出得埔银六十五两正,情愿自备牛犁方建筑坡圳,前去耕垦,永为己业。历年所收花利照庄例一九五抽的,及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车运到港交纳。二比甘愿,日后不敢生端反悔,增加减少,亦不敢升合拖欠;如有拖欠定额,明官究讨。”[25]佃户与垦户签订契约,向垦户承租土地,自备农具、耕牛、种子,并有一定的资金,可以修筑陂圳,开荒耕种,其向垦户交纳的租税称为“大租”。佃户实际上永久拥有其所开垦土地的使用权,如上引文书所谓“永为己业”,这就是永佃制。佃户可以自由处置其永佃权,包括出售、转让、遗赠等,还可以出租给现耕佃人耕种,这样便形成“一田二主”的租佃关系。

现耕佃人是向佃户租种土地进行种植的实际耕种者。他们或者是晚到的移民,已经没有荒地可以开垦,或者是自己缺乏农具和开垦资金,不能向垦户承租土地开荒,因而只能承租佃户开垦的土地进行耕种。有招耕文书记载:“立招耕字人廖宁,承领江福隆罩兰埔地一所,招得张乃华自备锄头火食,前来耕作水田三分零六毫四丝。每年该纳大、小租谷四石五斗九升六合,早、晚二季重风量清,年冬丰凶,不得少欠;如有少欠,任从田主招佃起耕;若无欠租,任从耕作。倘本佃无力耕作,准其亲人接耕,不准私卖他人;如无亲人接耕,议定每甲田贴锄头工本银二十元与耕人,将田交还田主,不得异言生事。”[26]此处江

福隆是垦户(业主),廖宁是佃户(田主),张乃华是现耕佃人。现耕佃人向垦户交纳租税称为“大租”,向佃户交纳租税称为“小租”。所以,这份招耕文书明确写出现耕佃人张乃华应交纳“大、小租”。

在“一田二主”制下,土地产权被分割为土地所有权(田底权或田骨权)和土地使用权(田面权或田皮权),其中垦户拥有土地所有权,佃户拥有土地使用权,现耕佃人是实际的土地租种者。这种“一田二主”的租佃关系,是清代中前期台湾中部、北部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租税形式与土地所有制形态。实际上,这种土地经营方式是由福建移民主要是漳州籍移民从原乡移植到台湾的,也是闽台经济关系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

清代台湾的赋税收入与治理成本能否达到平衡呢?雍正九年(1731)台湾赋则改制后,全台各厅县每年新旧额通征粟189943石,每年应支销全境兵粟及拨运内地兵眷粟共171910石,逢闰加支粟11382石。[27]清朝驻防台湾水陆各军一万余人之兵粟及兵眷粟,全部由岛内田园正供额粟米支销。从这个正税收入支付驻军开销就所剩无几的状况看来,清代台湾的治理成本是无法自给自足的,实际上台湾是需要内地协饷支援。光绪十二年(1886),闽浙总督杨昌濬与台湾巡抚刘铭传会奏台湾建省问题时就提到经费方面的困境。有谓:“臣等悉心筹画,拟由闽海关每年照旧协银二十万两。经臣铭传咨请署福州将军古尼音布,嗣后由厦关径拨解台。至闽省各库,无论如何每年协银二十四万两,陆续解筹。并请旨敕下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济银三十六万两。共成八十万两,以五年为期。统计闽省库、闽海关所协四十四万两,合之台地岁入百万两,专用防军月饷之需。五关每岁各协银七万余两,集腋相资,尚属轻而易举。台疆得此巨款,庶不致尽托空言。……如三五年后,能照部议,以台地之财供台地之用,即当奏请停止协款。”[28]这里说明当时台湾每年都需要闽海关及福建省库的协款,台湾建省并没有充裕的财政基础,不仅需要福建省库及闽海关原有协款,而且还需要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海关的协款。这也充分说明了闽台一体以及台湾与内地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三、台海两岸形成休戚与共的经贸圈

随着清朝开发台湾的进程,农产品逐渐商品化,贸易市场日渐形成,台湾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内外贸易日趋繁荣。无论是台湾岛内商品流通,还是台海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使台湾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经济区域。

(一)关于台湾岛内贸易。清初台湾岛内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据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纂修《台湾府志》记载,当时台湾府治所在地便有菜市与柴市。“菜市一所,在宁南坊府学旁隙地,五鼓时菜园人各以牛车装载杂色蔬菜瓜果等物,于此聚卖。柴市在宁南坊坟山边隙地,近山人亦以牛车装载柴薪,于此聚卖,晡时方散。”[29]不仅民众日常生活需要的菜与柴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其实台湾最重要的农产品米与糖也成了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货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30]随着各种商品流通的增加,便逐渐形成一些重要的贸易市镇。台湾府与台湾县治所在地台南是发展最早的中心集贸市镇,不但人口较多,而且商贸发达,所谓“民居稠密,市肆纷错”。[31]台湾中部的鹿港(鹿仔港)与北部的艋舺也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市镇。鹿港在彰化县城外二十里,“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32]台北的艋舺“民居铺户约四五千家,外即八里坌口,商船聚集,阛阓最盛,淡水仓在焉。同知岁中半居此,盖民富而事繁也”。[33]台湾谚语所谓“一府二鹿三艋舺”,就是说的台南、鹿港、艋舺是清代台湾三个最繁华的商贸市镇。

清代台湾岛内贸易的发展,还表现在汉族与山地少数民族之间贸易的加强。清代台湾山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其与汉族之间的贸易活动普遍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他们用鹿皮“以易汉人盐、米、烟、布等物”。[34]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与汉人的交易要通过翻译中介,即通事。“社番不通汉语,纳饷、贸易,皆通事为之。通事筑寮于隘口,置烟、布、盐、糖以济土番之用,易其鹿肉、鹿筋等物。每年七月进社,至次年五月,可以交易;过此,则雨多草茂,无能至者。”[35]通过与汉人交易,少数民族也逐渐改变了生活方式。比如,在衣饰方面,正是与

汉人交易布匹，他们开始学会了用布。“男女多著鹿皮。或织树皮苎麻为布，极粗厚，日以作褷，夜以覆体；今与汉人交易布匹。男以布尺余遮前，后体毕露。以皮为帽，不畏荆棘。吉事则以鸟羽为饰。妇俱以布裹头。”[38]可见，这些交易活动的进行，有助于台湾山地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文化的进步及与移居岛内的汉族关系的发展，对于清代台湾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不能不说有积极作用。

(二)关于台海两岸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后，清朝开辟从福建厦门经澎湖到台南鹿耳门的两岸对渡航线，开始有意管控两岸人员往来及经贸交流。两岸对渡贸易是清朝防止走私的有效管理手段，并不是有意限制两岸贸易规模。事实上，就在只有这唯一一条两岸对渡航线的情况下，当时台海两岸贸易仍非常活跃。据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在康熙、雍正之交的观察，台海之间的经贸如次：“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蓊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果、橘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菰，建宁则载茶；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饧、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枲绵、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绫罗、绵绸、绉纱、湖帕、绒线；宁波则载绵花、草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海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39]台湾不仅与福建漳州、泉州、兴化、福州、建宁、厦门有经贸往来，还与上海、苏州、浙江宁波、山东及关东有贸易活动。东部沿海数省既是台湾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又是岛内所需各种货物的采购基地，台海两岸经济上互通有无，自然融入一个休戚与共的经贸圈内。闽台经贸圈的形成，是台海两岸经贸一体化的重要表征。

随着台湾中部与北部的开发，清朝不断增开两岸通商港口，并适时调整对渡制度。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五年(1790)，相继开辟福建泉州蚶江口到台湾彰化鹿仔港、福州五虎门到台北淡水厅八里坌的两条对渡航线。嘉庆十五年(1810)，清朝不再限制两岸港口分别对渡，允许福建三口与台湾三口互相通行。道光六年(1826)，又增设台湾彰化县海丰港(五条港)、噶玛兰厅乌石港为通航正口，加上原有鹿耳门、鹿仔港、八里坌三口，台湾对福建通航增加到五口，与福建之厦门、蚶江、五虎门三口，共同构成台海两岸商民往来交流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两岸贸易非常繁荣，于米谷贩运可见一斑。乾隆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台湾业已成为东南沿海粮仓，台米不断被贩运到内地。“台郡土沃产饶，内地兵粮、民食积储，岁多取给于台产米谷，輓运转输之事，殆无虚日。”[40]其时台湾例运内地兵谷眷谷6万余石，又例运糶谷12万石，还临时派委员来采台买米谷约10万石，此外商船定例及私贩偷运者估算为20万石，总计每年台湾运往大陆米谷约在50万石左右。[41]台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福建漳州、泉州等府缺米的困境，在闽台关系中起到了良好的反哺作用，是加强两岸联系的经济纽带。

清代台海两岸贸易中值得注意的是郊的组织。郊又称郊行或行郊，是以大商人为中心，专事聚货、采办、分售的商业贸易集团，一般有数十个或上百个商号组成，主要从事台海两岸贸易。台湾的郊兴起于乾隆、嘉庆年间，最早出现的是台南三郊：北郊、南郊与糖郊。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北郊由以苏万利为首的20多家店号组成，专营厦门以北各港口包括宁波、上海、烟台、天津、牛庄等地贸易。几年后，台南又出现以金永顺为首的30多家商号组成的南郊，专营对台湾以南各港口包括厦门、金门、漳州、汕头等地贸易。随后又成立以李胜兴为首的糖郊，由50多家专营糖米出口贸易的商号组成，主要经营台糖、台米及其他农产品，以贩运大陆各地。台湾中部的鹿港也有泉郊、厦郊与南郊，泉郊主要经营与泉州地区的贸易，厦郊则与厦门、金门、漳州地区的贸易，南郊与澎湖、广东等地区的贸易。道光、咸丰年间，台湾郊行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原有各郊行经营范围与贸易量得到大力发展，而且出现不少新的郊行。如台北的艋舺成立泉郊，主要从事福州、泉州地

区的贸易;艋舺还有北郊,经营福州及其以北地区包括宁波、上海、天津、锦州、盖州等地的贸易。同治、光绪时期,台湾被迫对外开港,外国轮船介入,倾销洋货,大批货物进出淡水、鸡笼(基隆)、安平、打狗(高雄)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严重破坏了传统的郊商贸易,台湾郊行走向衰落。[40]

四、被迫开埠通商与半殖民地化

鸦片战争之前,已有英、美商人潜入台湾从事贩卖鸦片与煤炭、樟脑等货物的非法贸易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中英、中美、中法五口通商贸易章程均明确规定,外国商民只能在上述五个港口居住贸易,不得在其他港口从事非法贸易活动。如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望厦条约》)第三条规定:"嗣后合众国民人,俱准其挈带家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共五港口居住贸易,其五港口之船只,装载货物,互相往来,俱听其便;但五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驶入别港,擅自游弋,又不得与沿海奸民,私相交易;如有违犯此条禁令者,应按规定条例,将船只、货物俱归中国入官。"第三十三条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41]尽管如此,但英、美等外国商人都希望在台湾开辟通商口岸,使其在台走私贸易取得"合法"的地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八年(1858),清朝被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其中中俄、中美、中英《天津条约》均规定开放台湾府城为通商口岸。如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42]中法《天津条约》则在台湾府城之外,另增淡水口岸,其第六款规定:"中国多添数港、准令通商,屡试屡验,实为近时切要,因此议定,将广东之琼州、潮州,福建之台湾、淡水,山东之登州,江南之江宁六口,与通商之广东、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令通市无异。"[43]根据"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台湾开辟府城与淡水两口适用于所有有条约关系的列强。

咸丰九年(1859),美国公使华约翰(John E.Ward)以中美《天津条约》先行换约,照会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在广东潮州、福建台湾先行开市贸易。何桂清以原议条约之大学士桂良等所谓"各口通商,不止贵国一处,此时口英、口弗条约尚未议定,未便两歧,恐碍通商大局,似应俟口英、口弗两国一律定议之后,再开新章"为由,予以驳覆。[44]何桂清与华约翰多次往返照会,并在崑山会晤,双方相持不下,不得要领。清朝有鉴于"潮州、台湾两处,各国私自买卖,已越三年,此次美使恳请先行开市,亦因贸易已久,欲掩其私开之迹,尚属心存恭顺,自未便执意阻止",谕令"所有潮州、台湾两口,准美国先行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45]闽浙总督庆瑞等奏请选取沪尾为台湾开埠地址,并派福建候补道区天民前往经办,只等美国领事到台即可开市贸易。[46]由于美国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一时无暇顾及此事,华约翰公使匆忙回国,美国派领事赴台先行开市之事暂时被迫搁置。

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首任驻台湾副领事郇和(R.Swinhoe)赴台驻扎沪尾,与福建候补道区天民商议开埠地址。[47]区天民会同台湾镇总兵林向荣、道员孔昭慈、知府洪毓琛勘定淡水厅辖八里坌地方设关征税,暂借沪尾守备旧署作为税关,于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2年7月18日)正式开关。[48]淡水(沪尾)海关是台湾开辟的第一个通商口岸。

按照《天津条约》规定,台湾开放府城与淡水两口。同治二年(1863),福州关税务司美里登(B.Meritens)以增加海关税收为由,禀请总理衙门增开鸡笼与打狗两口,"以鸡笼口作淡水子口,打狗港作台湾府子口"。总理衙门表示赞同,并决定把子口改为外口,有谓:"惟子口税银向只征收半税,今查鸡笼、打狗二口既须收洋商进出口正税,并收复进口半税,则打狗一港可作台湾之外口,鸡笼一港可作淡水之外口,所收收税银,仍将台湾、淡水造报,行文查照。"闽浙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耆龄、福建巡抚徐宗幹督饬

台湾道、府及通商委员详议试办。[49]鸡笼与打狗(旗后)两口,分别于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863年10月1日)和同治三年四月初一日(1864年5月6日),正式开关征税。[50]

至于台湾府城开放,则颇费周折。同治三年(1864)初,闽浙总督左宗棠、福建巡抚徐宗幹以"台湾府城海口淤滞,船只不能收泊,难作通商码头",奏请台湾府城未便设立税口。总理衙门认为:"台湾准其通商,系载在条约,能否变通办理,必须与各国驻京使臣会商,方能定见。"并请与总税务司赫德商议。[51]限于所见史料,详情不得而知。直到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865年1月1日),台湾府城(安平)海关才正式开关。[52]至此,台湾南北四个通商口岸全部对外开放。

台湾府城(安平)、打狗(高雄旗后港)、鸡笼(基隆)、淡水(沪尾)四个通商口岸开放后,外国资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量涌入台湾市场,使台湾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据海关贸易资料统计,同治四年(1865)台湾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327121海关两,到光绪二十年(1894)达到12694495海关两,年平均增长率为6.02%,而同期中国全国对外贸易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28%。近代台湾对外贸易的出口产品以糖、茶、樟脑及煤等为大宗,进口货则主要有鸦片、棉毛织物及各种杂货等。[53]

外国资本侵入台湾,其严重的后果是使台湾迅速成为列强倾销洋货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市场。外国洋行取代郊行控制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又使台湾的进出口贸易由开港前的完全依赖大陆市场转变为基本上依赖国外市场,从而使台湾地区对外贸易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并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从而加深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这是台湾在近代的命运,与近代中国同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五、洋务运动与近代化启动

洋务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在内忧外患之下被迫向西方学习进行近代化变革以挽救王朝统治的活动。台湾的近代化始于洋务时期,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之后,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开其端,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集大成。他们在台湾的一系列自强新政举措,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

(一)创办近代工矿企业。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沈葆桢等奏请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征税,并广开台矿,总理衙门议覆令沈葆桢等事先预筹一切办法,"俾利普于公,权操自我"。[54]沈葆桢通过总理衙门由总税务司赫德代为延聘一位英国矿师翟萨(D. Tyzack),在中方委员何恩绮、李彤恩的协助下,到台湾北部勘察,确定开采基隆煤矿。光绪三年(1877),基隆煤矿正式投产出煤。基隆煤矿采用新式机器开采,工人2000多人,最初日产煤量30-40吨,高峰期达到150吨,是近代中国最早投产的新式大煤矿。中法战争后,刘铭传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基隆煤矿,并成立煤务局,由著名绅士林维源出面招商,引进民间商业资本,采用官商合办形式经营,购买新的采煤机器,一度使基隆煤矿颇为兴盛,后因收归官办而日渐衰落。除了基隆煤矿以外,刘铭传还在台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开采、熬制硫磺;又创办机器锯木厂,用新式机器生产木材。台湾官府还鼓励商人引进外国造糖铁磨及新式制糖机器,改良蔗糖生产技术;并引进日本脑灶,提高樟脑生产水平。在刘铭传等洋务派的推动下,近代民族工业在台湾得以艰难起步。

(二)修建新式交通设施。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沈葆桢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李鹤年以台海远隔重洋,"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会奏开设由福州陆路至厦门、厦门水路至台湾的电报线。[55]此为台湾创设电报线的最初动议。光绪二年(1876),丁日昌奏请在台湾开设由旗后经府城到基隆的电报线。[56]刘铭传时期在台湾架设水陆电报线1400余里,分别在川石、沪尾、澎湖、安平设水线房四所,在台南、安平、旗后、澎湖、彰化、台北、沪尾、基隆设报局八处。[57]刘铭传还创办新式邮政,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在全台设立正站、腰站、旁站40余处,发行邮票,官商通用,极为便捷。[58]台湾近代邮电网络于以肇端。

台湾修铁路之议始于丁日昌。光绪二年(1876)冬,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轮路),称"轮路最宜于台湾",铁路与矿务是台湾自强"奏功之针石"。其

议得到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的赞同。南洋大臣沈葆桢称“铁路最为台地所宜行”。北洋大臣李鸿章称“铁路、电线相为表里，功用最大”。总理衙门认为“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59]丁日昌还奏准把上海被拆除的吴淞铁路器材运到台湾，为修建铁路之用，并邀请吴淞铁路英国工程师玛理逊(G. J. Norrison)来台相助，但因丁日昌离职此事不了了之。[60]刘铭传是非常重视铁路的洋务派大员。他认为：“铁路为国家血脉，富强至计，舍此莫由。”[61]他从中法战争中体认到铁路对台湾防务的军事战略价值，因此在战后即奏请开办铁路，有谓：“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即骨节灵通，首尾呼应。”“铁路一事，为安内攘外刻不容缓之急图。”[62]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开始修筑从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光绪十九年(1893)全线竣工，全长106.7公里。这是台湾铁路之肇始，也是洋务时期中国自主修筑的一条重要铁路。

(三)加强近代海防建设。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沈葆桢等奏请“储利器”以加强台湾防务，主张向西方购铁甲船、水雷、洋枪、洋炮。[63]光绪二年(1876)冬，丁日昌渡台之后统筹台防全局，也主张购铁甲船，练水雷军，建造炮台，练枪炮队。[64]刘铭传在中法战争以后形成海防与陆防兼备的台海防御观。一方面，是建海军，购兵船。早在刘铭传受命赴台前夕密奏整顿海防时，就曾主张设立海部衙门以总管海军事务、创办海军学堂以培养海军人才、筹集经费以购买兵船，目标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加强海防。[65]中法战后，在筹议台湾善后事宜过程中，刘铭传又一再奏请调拨或购买兵船，以加强台海防御。[66]另一方面，是练陆兵，筑炮台，购枪炮。海防不是孤立的水面防御，必须要有陆上的炮台等设施相配合，尤其是要有协同作战的地面部队。在筹备台湾善后时，刘铭传特别强调“演习洋操”和熟练使用“后门枪炮”等器械的重要性。刘铭传在台湾各重要海口共造炮台十座，其中澎湖四座，基隆、沪尾各二座，旗后新添一座，安平修葺一座。[67]在亲往台南、澎湖等地视察海口形势后，刘铭传坚定了购买西洋精利大炮的决心。他通过英国怡和洋行购买了阿马士庄新式后膛钢炮三十一尊，安置于基隆、沪尾、旗后、澎湖等海口。[68]刘铭传在台湾还购买了后膛洋枪万余杆，并在台北设立大、小机器局厂，制造炮弹和枪弹；又建造军械所，以备储存军械。[69]刘铭传等人推动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建设。

(四)兴办新式教育事业。近代化建设需要近代新型人才，人才来源于教育。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刘铭传在台北设立西学堂，招收年轻质美之士二十余人，延聘洋教习教授西方语言文字及近代科学知识，并聘请汉教习教授国文。一年之后，刘铭传亲自考察，“所习语言文字，均有成效可观。拟渐进以图算测量制造之学，冀各学生砥砺研磨，日臻有用。而台地现办机器、制造、煤矿、铁路，将来不患任使无才”。[70]以后逐年增招学生，增聘洋教习与汉教习，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为台湾近代化培养急需的西学人才。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在著名洋务派代表性人物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地处东南海疆前沿的台湾得风气之先，各项洋务事业均有起色，近代化进程得以顺利开展，甚至走在大陆许多省份之前，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

六、结语：关于清朝治台经贸政策的反思

关于清朝治台政策及其效果，“台独”论者肆意歪曲抹杀，甚至一概否认，妄称“综观整个满清历史时期，统治者并未负起开发台湾的责任”。[71]从清政府开发台湾的经贸政策来看，康熙统一台湾之后200余年间，历代统治者在台湾推行发展农业生产、减免田园赋税、促进商品贸易，以及兴办洋务事业等措施，不仅大大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使闽台经贸圈形成，从经济上加速了台湾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使台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一笔抹杀清朝洋务运动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这更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晚清时期，面对日本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加强海防建设，台湾从福建省的一个府，升格为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行省。在洋务派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领导与推动下，台湾的洋务运动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也得以顺利开展。这个毋庸置疑的客观历史事实，是对

“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有力驳斥。

注释：

①蓝鼎元：《平台纪略》，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页。

②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14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06页。

④《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台湾文献丛刊》第15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版，第1页。

⑤李丕煜主修：《凤山县志》卷2，规制志·水利，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清代台湾方志汇刊》第5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第93页。

⑥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07页。

⑦周钟瑄主修：《诸罗县志》卷2，规制志·水利，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清代台湾方志汇刊》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第112页。

⑧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13页。

⑨参见蔡志展《明清台湾水利开发之时空分析(1624-1895)》，台中《社会科教育研究》第3期，1998年，第89-90页。

⑩参见黄克武《清代台湾稻作之发展》，台北《台湾文献》第32卷第2期，1981年6月，第157页。

⑪《禁饬插蔗并力种田示》，高拱乾等修：《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台湾府志三种》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4-1066页。

⑫范咸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卷4，赋役一·土地，《台湾府志三种》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0-1581页。

⑬《为奏台地开垦事》(闽浙总督高其倬，雍正四年十一月八日，上奏)，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2辑第11册，台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台湾大学图书馆、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版，第157页。

⑭蓝鼎元：《复制军台疆经理书》，《东征集》卷3，《鹿洲全集》下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页。

⑮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版，第51页。

⑯《为请开台湾遏米之禁接济泉漳民食事》(闽浙总督高其倬，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2辑第11册，第65-66页。

⑰以上参见杨国桢《清初台湾农业区域的形成》，《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第4页；林仁川《明清时期台湾的稻米生产》，《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第8页；王世庆《清代台湾的米产与外销》，《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版，第100页。

⑱施琅：《请蠲减租赋疏》，余文仪主修：《续修台湾府志》(下)卷20，艺文一·奏疏，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清代台湾方志汇刊》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918-919页。

⑲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卷7，赋税·田赋，《台湾府志三种》上册，第150-151页。

⑳周钟瑄主修：《诸罗县志》卷6，赋役志·户口土田，《清代台湾方志汇刊》第3册，第164页。

㉑《为访陈台郡田粮利弊仰请圣裁事》(巡台御史索琳等，雍正五年八月十二日，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2辑第11册，第370页。

㉒《台地田园征额》(户部，雍正九年，其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2辑第14册，第213-214页。

㉓尹士俍纂修：《台湾志略》，李祖基点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㉔《台湾私法物权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5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版，第193页。

㉕《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台湾文献丛刊》第15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版，第60-61页。

㉖《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台湾文献丛刊》第15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版，第153页。

㉗朱景英：《海东札记》，陈庆元主编：《台湾古籍丛编》第4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㉘《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马昌华、翁飞点校：《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16页。

㉙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卷6，市廛，《台湾府志三种》上册，第131页。

㉚陈培桂纂辑：《淡水厅志》卷11，考一，风俗考，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清代台湾方志汇刊》第28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版，第392页。

㉛陈文达：《台湾县志》卷2，建置志·城池，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版，第69-70页。

㉜周玺总纂：《彰化县志》(上)卷2，规制志，街市，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清代台湾方志汇刊》第21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版，第129页。

㉝姚莹：《台北道里记》，《东槎纪略》卷3，《中复堂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579页。

㉞范咸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卷16，风俗四·番社通考，《台湾府志三种》下册，第2226页。

㉟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第88页。

㊱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版，第114页。

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版，第47-48页。

㊳《为备陈台地輓运米谷情形仰恳圣恩准销水陆运费事》(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2辑第23册,第56页。

㊴参见王世庆《清代台湾的米产与外销》,《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版,第106-107页。

㊵以上参见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45页;黄福才《论清代大陆与台湾贸易各阶段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㊶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1-52、56页。

㊷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7-98页。

㊸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5页。

㊹《为咪酋请照新章完纳船钞即在潮州台湾先行开市订勘等事》(两江总督何桂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朱批),《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64册,台湾历史博物馆、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台湾大学图书馆,2008年版,第146-147页。

㊺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2页。

㊻《为奏美在台湾开市事宜事》(闽浙总督庆瑞等,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64册,第257-258页。

㊼参见叶振辉《清季台湾开埠之研究》,台北:标准书局,1985年版,第92-93页。

㊽《闽浙总督耆龄奏报于台湾沪尾设关开市通商征税事》(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片,档号03-9491-072,缩微号677-2645。

㊾《为台湾通商添设外口征税请先行试办恭折会奏仰祈圣鉴事》(闽浙总督左宗棠等,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朱批),《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65册,第457-458页。

㊿《福州将军英桂奏报台湾添设旗后口开关启征日期事》(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385-044,缩微号04-01-35-022-0215。

(51)《为奏台湾府城未便设立税口筹议办理情形事》(闽浙总督左宗棠等,同治三年正月十七日,朱批)、《为奏台湾府城未便设立税口筹议办理情形事(附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朱批),《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66册,第119-120、122页。

(52)参见叶振辉《清季台湾开埠之研究》,台北:标准书局,1985年版,第93-94、165-166页。

(53)以上参见李祖基《近代台湾对外贸易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54)《为拟广开台矿并拟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税则一律征收以昭平允事(附片)》(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等,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九日,朱批)、《为议覆沈葆桢等奏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征税附片事》(恭亲王奕䜣等,同治十三年八月,推测),《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73册,第379、393-394页。

(55)《为遵旨会筹日本兵船现泊厦门一事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福州将军文煜等,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朱批),《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72册,第372-373页。

(56)《奏台湾设立电线片》(光绪二年),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57)《台湾水陆电线告成援案请奖折》(光绪十四年五月初五日),马昌华、翁飞点校:《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92页。

(58)参见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1982年版,第333页。

(59)《统筹台湾请开办轮路矿务疏》(光绪二)、《筹办台湾轮路事宜疏》(光绪三),《丁日昌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73页。

(60)参见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1982年版,第326页。

(61)《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04页。

(62)《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光绪十五年二月初八日台北府发),《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1页。

(63)《为遵旨会筹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福州将军文煜等,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朱批),《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72册,第375-376页。

(64)《台事宜统筹全局疏》(光绪二),《丁日昌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65)《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在京发),《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4-55页

(66)《请拨兵商各轮船片》(光绪十一年五月)、《购买轮船片》《添购轮船片》(光绪十三年五月)、《交售旧轮船以资新购折》(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84、184-185、187-188页。

(67)《修造炮台并枪炮厂急需外购机器物料片》(光绪十四年六月),《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01页。

(68)《买炮到防立案片》(光绪十五年五月),《刘铭传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98页。

(69)《奏报造成机器局军械所并未成大机器厂折》(光绪十四年六月),《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00页。

(70)《台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四日),《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34-235页。

(71)陈芳明:《台湾研究与后殖民史观》,台北《历史月刊》,1996年第105期。